

一场超大阵仗的送别

诗与远方,是最浪漫的组合。古人迎来送往时,菜肴未必丰富,弦箫未必悦耳,但赠诗是必不可缺的。唐开元十年(公元722年)张孝嵩出塞时,张九龄、王翰、贺知章等一千文艺大咖送行赋诗并结集《朝英集》,一时传为佳话。开元二十一年,慕容潜辞官南归,“一时文士咸赋诗祖饯,甚荣”,这文士里有王湾、崔颢、祖咏、王昌龄、常建、崔辅国、王维、薛据、李颀、高适、韦应物等。到了崇文盛世的宋代,这送别的排场自然更大了几分。咸平元年(998年)杨亿赴处州、咸平四年钱若水赴大名府,均有三十多人送行赋诗。不过,若论送别赋诗的数量,高居榜首的唯有熙宁十年(1077年)十月这次。

送别名单卧虎藏龙

这次送别阵仗大得惊人,规格也高得惊人,真真汇集了百余政界学界名流,可谓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。翻翻第二年(元丰元年)十一月成书的《续会稽掇英集》,总计五卷的留言册上收录了一百二十五篇送行诗,令人咋舌。长长名单上充斥着众多眼熟的名字:

时任宰相吴充、王珪,节度使、太傅、鲁国公致仕的曾公亮,镇南军节度使兼检校太傅王安石,镇江军节度使陈升之,给事中枢密院事冯京,参知政事元绾,宣慰南院使张方平,宣徽北院使王拱辰,以太子少师致仕的赵概……

在两府宰执、节度使这些高段位大佬面前,原本显赫的学士、直学士只能屈居其后了:枢密院直学士曾孝宽和陈襄、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孙

固、翰林学士三司使沈括、龙图阁直学士宋敏求、王益柔、致仕卢革……

接下来,就是知州级别的官员了:滕甫、晏知止、黄履、郑穆、谢景温、范百禄、彭汝砺、陈季长、韩铎、李中师、钱藻、范子奇、吕嘉问、曾孝宗……

再后就是诸多学术界名流(太常博士):刘奉世、虞大熙、陈睦、吴安持、何琬、石麟之、崇大年、吕大忠、蔡承禧、赵君锡、林希、毕仲衍、范育、莫渊、韩宗古、上官均、毕仲连、孔平仲……

名单里的许多人于后世读者很陌生,貌似打酱油的众多路人,但当时这些人都名声赫赫。如皇祐间进士何琬,他七历监司,神宗尝书其名于屏,“政事何琬”,被大老板记挂在心,这是何等等的荣誉!再如范育,他是理学创始人张载的弟子,后来镇守秦州、熙河,战功累累。

被送行的主角

这么大的送行阵仗,那被送行的主角是何方神圣?

程师孟字公辟,号正义,苏州吴县(今江苏苏州市)人。他是景祐元年(1034年)张唐卿榜进士,同年有杨察、柳永、苏舜钦、梁适、刘安世、张耒、柳三友柳三接兄弟等。

程师孟朝堂上如透明人一般存在,因为他的职场经历绝大多数耗费在地方上:光水、钱塘等县的一把手,桂州通判,楚州、夔路、河东等地提点刑狱。嘉祐元年(1034年)至八年,他知洪州八年;熙宁元年,他知福州两年;此后又知广州六年。英宗时,他入京任三司都磨勘司,管理河北四榷场事务。熙宁后

期他曾入京为给事中、集贤殿修撰。工龄四十三年,任京官仅三年,声名不显很自然。

所谓“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”。北宋时闽人、楚人(宋时江西称楚地)在进士里比例颇高,若论两宋文状元数量,闽人更居全国之冠。而程师孟恰好在两地作父母官多年,因此在京官里不缺人脉。看看这赠诗名单,吴充、曾公亮、陈襄、黄履等是闽人,崇大年等二三十人都有福建为官的经历,王安石等十人为楚人。

北宋仁宗至神宗是历史上文人气息最浓的时代,文化昌明,程师孟与众多文坛大咖也多有交集。皇祐四年(1052年)他提点夔州路刑狱,湖州人张先知渝州,两位江南人聚于这偏僻的夔州,相知相交。

不同的故事和结局

这里面有庆历四年进奏院案里的对手:王拱辰、张方平和王益柔、宋敏求等。当年洪州人李定(宰相晏殊之甥)听闻进奏院有苏舜钦(字子美,宰相杜衍女婿)组织的宴会,便想去蹭个流量,结果被后者断然拒绝。被打脸的李定做足了功课,转身跑到御史台告发,把柄是王益柔宴会上《傲歌》的句子,“醉卧北极遣帝扶,周公孔子驱为奴。”须知好脾气的仁宗皇帝最忌讳欺师灭祖的狂妄青少。王拱辰做主攻手,朝上张方平、宋祁暗地里推手,于是苏舜钦等一千范仲淹、富弼的粉丝被一网打尽,范、富二人惧祸自请外放,庆历变法无疾而终。

二十年后的熙宁变法的规模和强度更升了几层。变法之初,锐意改革的王安石睥睨朝廷,单挑中书省其他同僚,战力爆表,有“生老病死苦”的传奇,即安石生、公亮老、富弼病、唐介死、赵忬苦。

再来说说谢景温。庆历六年时,他任会稽知县,其兄景初知余姚,王安石知鄞县,韩缜知钱塘,四人组团兴修水利,一起荡着友谊小船,别提多爽。熙宁三年,司马光与范镇原打算举荐苏轼为谏官,这自然触了安石的霉头,安石于是举荐谢景温为台谏。上任伊始,谢景温便风闻奏事,弹劾苏轼父丧归蜀,

贩卖私盐、苏木等。虽然后来证实不实,被惊吓的苏轼只好自请外放杭州。

这众多人里,额头上被后世贴着各种标签:“元丰党人”“元祐党人”“调和派”,在元祐党人中又分出蜀派、洛派、朔派等。吕惠卿的岳丈黄履、黄履的岳丈沈括都属于变法派,与蔡确、章惇关系友善。赵君锡后来与贾易一起成为苏轼兄弟的死对头。为孔道辅写墓志铭的是荆公,而为其写神道碑的是反对变法的张宗益……

熙宁元丰之交,熙宁变法的第一幕刚刚拉上帷幕,舞台上主要演员都身心交瘁,疲惫不堪。旧党方面韩琦、吕公著、文彦博、司马光、赵忬都已靠边站,势力大弱。新党这边也好不到哪里:吕惠卿和曾布斗得两败俱伤,沈括被蔡确弹劾,谢景温与安石闹翻,荆公第二次辞相……

此后朝堂上的波诡云谲出乎在场所有人的意料,先是多年前的相州案被翻出来,当年末太学案又起……上述人等被牵涉其中的不知凡几,苏轼兄弟也未能幸免。身在朝堂之外的程师孟是幸运的,他依旧丝滑地延续着自己的仕途。

他知越州时重修当地宝林寺塔,陆游的爷爷陆佃在《越州宝林院重修塔记》为其频频点赞。秦观于元丰二年来会稽省亲,也与师孟守有了交集,有《和程给事赠虞道判六首》。

知越州三年后,程师孟转知青州,接任他的就是送行队伍里的郑穆。从青州退休后,程师孟在江宁与老友王安石相会。钟山脚下,居江湖之上两位垂暮之人,谈诗论史,好不悠闲。

回到苏州的程师孟,效仿中唐元白,也组织了吴中十老会,与司马光在洛阳组织的西京耆老会遥相呼应,参加者有卢革、王珪、崇大年、张洸等当年的送行者。在党争的战场外,在个人的余生里,诗意地栖息,怎一个快意了得!“论道频年有虚席,搏风一击好收身。”卢革当年的送行诗句恰恰契合这种心态。

只那送行时的风和花,诗与歌,直飘过千年,吹到今日,后人犹能品味与陶醉那场宏大且浪漫的文化盛会与无尽风情。

(据《北京青年报》)

谢国桢藏书

史学家谢国桢一生俭朴、爱好藏书。他署其书斋曰“瓜蒂庵”,意指在收藏一些善本古籍过程中,善本书籍、佳名钞,他是买不起的,只能拾些人弃我取、零篇断羽的东西,好比买瓜拾些瓜蒂而已。晚年还写过一首自述诗:“重逢盛世百无能,坐守青毡过一生。浪掷年华虚岁月,拾得瓜蒂结瓜成。”

谢国桢每月收入的三成成为膳宿杂用,七成则花在买书上。北京琉璃厂东街是谢国桢去得最多的地方,哪怕晚年行动不便,也要隔段时间去那里的古籍书店转转,阅读访书、打听行情。对书籍近乎痴狂的热爱,在他众多的书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每当发现珍稀史料,即使囊中羞涩,也会想方设法将其收入囊中,那种得书后的喜悦,足以让他的“老眼状明”,那份对知识的渴望和对学术

的热忱,跃然纸上。

1979年,意识到自己身体状况日益不佳,谢国桢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,他致信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,表达了无偿捐献个人藏书的心愿。这些藏书包括明清笔记、别集杂史以及汉晋碑帖、砖瓦拓片等珍贵史料,是谢国桢毕生心血的结晶。在他看来,这些图书不应为个人所有,而应成为“天下公器”,供后学研究利用,让学术的光芒照亮更多人的心灵。

1981年,谢国桢更进一步将获得的3万元奖金全部捐出,用于增购书籍资料,旨在促进明清史研究,使之成为该领域的资料中心。1982年,谢国桢离世后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特别设立“谢氏瓜蒂庵藏书室”,以纪念这位学术巨擘。

(据《人民政协报》)

